

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 冷战时期 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

蒋华杰

摘要 本文利用馆藏档案考察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这一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个案,解读中阿双方基于两国政治联盟关系在实习生群体中进行的以“塑造社会主义兄弟友谊”为目标的公共外交政策行为。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史实表明,革命外交路线之下的公共外交行为的基本特征以追求单一的意识形态共同性为前提和目标,但是由于过分追求意识形态目标,难以实质性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 阿尔巴尼亚 实习生 意识形态 公共外交 革命外交

冷战时期,实习生培训既是国际经济技术援助的一种重要途径,^①同时也成为塑造国家关系形象并宣传援助国自身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框架内,实习生因为“无产阶级劳动者”的个体政治身份和“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紧密契合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间公共外交的主要角色。

在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中阿关系无疑最为特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因奉行激进的革命外交而日益孤立之际,阿尔巴尼亚成为毛泽东推行革命外交的试金石。作为规模最大并且内容最复杂的一个群体,数千名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以阿国产业工人出类拔萃的代表身份,成批地来华接受技术培训并体验“革

* 蒋华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10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 本文系2010年度北京东方历史学会基金项目(研究类“社会主义国家在华实习生的历史考察——以朝、越、古、阿四国在沪实习生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① 实习生是指在生产单位中接受短期(通常为一年)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干部。有关实习生的个案研究,可见董洁《对在京朝鲜实习生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命中”的中国社会。^①中国期望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公共外交行为,使实习生成为阿尔巴尼亚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栋梁”与“革命种子”,而且向世人展现一个真正团结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充满革命和发展抱负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联盟”形象。

本文的研究在补充现有中阿关系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认识的同时,^②意在加深关于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和理论认识。目前,在有关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中,绝大部分学者对冷战时期新中国开展的公共外交持宏观的正面评价,鲜有批评和反思。^③基于此,本文利用新近解密的中国外交部和地方档案,解读上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个案,探讨和反思冷战时期中国革命外交路线引导之下的公共外交政策行为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以此为未来中国公共外交政策的思考提供一份历史的参照。

一、阿实习生来华:技术转移之外的政治象征

1964年2月,春寒料峭,无锡庆丰纺织厂却开始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动员。数月前,该厂接到为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棉纺厂培训实习生的任务。^④当1月份周恩来访阿,阿方用“毛泽东联合纺织厂”命名棉纺厂后,培训工作被视为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环伺下帮助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⑤不久,厂党委成立特别筹备小组,为实习生提供最好的生活、医疗条件,由于援阿棉纺厂更为现代

① 由于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加之官方并未对频繁变动的实习生培训计划进行完整统计,因而,目前难以精确统计来华的阿实习生人数,笔者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粗略估算。详见“1963年接受外国实习生计划”,1963年7月1日,外交部档案,118-4215-44,第231页。“外经委专家实习生局1964年外国实习生统计表”,外交部档案,118-4577-4,第1—12页。

② 现有的研究都从大国关系和联盟政治的角度探讨中阿关系,主要可见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第40—54页。“Albania is not Cuba, Sino-Albanian Summit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CCWIHP Bulletin*, No. 16, Spring 2008; Elez Biberaj, *Albania and China: A Study of an Unequal Allia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6。

③ 公共外交包含了民间外交。有关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可见赵启正《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准确定义存有异议,但就行为主体、方式、目标而言,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因而,笔者认为一切为争取民心、塑造国家形象而规划的以两国民众为互动主体的外交行为均具有公共外交的内质,将冷战时期中国所开展的“民间交流”视为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关学界对冷战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评价,主要可见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钟龙彪、王俊《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内容与形式》,《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89—99。

④ “纺织工业厅关于安排阿方考察实习人员来省的请示报告及附件”,1964年9月2日,江苏省档,3124-0136,短期,第11—17页。

⑤ “纺织工业部关于加强援阿纺织联合工厂筹建工作领导小组”,1964年5月8日,江苏省档,3124-0136,短期,第22—24页。

化,技术人员要在两个月内完成繁重并且至关重要的教学准备。^① 动员工作还包括一项意在清除“危险分子”的措施,厂方通过摸查发现全厂五千名干部职工中有大量不良分子,28%的骨干干部有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工人俱乐部则因男女关系混乱而被戏谑为“豆腐店”。^② 2月份之后,三次大规模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陆续开展,干部职工被要求认真对待这项为最亲密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培养建设栋梁和革命种子的国际主义义务。^③ 同时,席卷全厂的审查也开始,工人们被要求相互检举揭发个人问题,^④负责具体培训工作的老师傅、干部、厨师、教员和翻译是审查的重点,^⑤凡有问题者均被视为“危险分子”并调离岗位。^⑥

1960年代,在中国最为现代化的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兰州等地,肩负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任务的中国工厂大部分进行了与庆丰厂类似的动员,这昭示出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任务的特殊性。

中国培训外国实习生政策源自1950年代中苏实习生培训计划,从1951年到1958年,8063名中国实习生赴苏接受技术培训,归国后在经济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⑦ 1953年年底,中共中央便将实习生培训视为一种可以迅速实现国家间技术转移进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援助途径加以推广。^⑧ 为了帮助朝鲜战后重建以及援助越南抗法,中国自1953年开始大量接收朝、越实习生,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内,至少有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3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五万多名外国实习生来华受训。^⑨

1956年,第一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来华接受农业、手工业技术培训,中方为此建立专门的接待和培训制度。^⑩ 1959年初,中国决定向阿提供总价值850万元的三个

① “江苏省纺织工业厅报送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接待方案”,1964年4月19日,江苏省档,3124-0136,短期,第30—31页。

② “市委宣传部关于庆丰纺织厂宣传工作的调查报告”,1964年1月16日,无锡市档,A4-2-107,第19—20页。

③ “江苏省纺织工业厅报送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接待方案”,1964年4月19日,江苏省档,3124-0136,短期,第32页。

④ 笔者采访刘亚琴,刘当时为该厂女工,2011年2月。

⑤ 同上。

⑥ “省纺织工业厅关于安排阿方派遣实习人员来省的请示报告及其附件”,1963年9月2日,江苏省档,3124-0136,短期,第15页。笔者采访刘亚琴,2011年2月。

⑦ “国家科委、教育部、外交部关于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59年7月27日,河北省档,855-48-658,第107—114页。

⑧ “中共中央为转发‘鞍山钢铁公司赴苏实习团关于实习经验的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和各级党委的指示”,1954年1月8日,河北省档,855-47-211,第1页。

⑨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1—244页。

⑩ “中阿两国关系大事记附表(1949至1959年)”,外交部档案,109-00908-02,第64页。“财政部关于阿尔巴尼亚派来我国实习生费用开支标准及办法”,1956年11月28日,河北省档,989-1-92,第195—197页。

成套项目^①,实习生培训工作相应加强。^②就在这批阿实习生即将启程之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剧变。1960年7月,中苏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冲突,惟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明确支持中共,苏阿关系随即恶化,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开始缩减并拖延援阿项目,而此时恰逢阿尔巴尼亚酝酿第三个五年计划,面对苏联刁难,阿尔巴尼亚转而求助于中国。9月,阿方提出援助要求。^③出于反苏考虑,中国决定援助25个价值5.5亿旧卢布的成套项目,次年4月23日,双方签订援助议定书。^④中国给予的成套项目大部分属于新建,阿尔巴尼亚国内具备管理、操作能力的技术干部和工人极为稀缺,因而,实习生培训工作就显得十分关键和紧迫,当日,中阿签订了《关于专家、技术人员和实习人员的待遇条件的议定书》,^⑤中方将根据援助进度大量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从1962年开始,阿尔巴尼亚被列为最优先接收实习生的国家。^⑥

尽管数量远不及1950年代来华的朝、越实习生,^⑦但正如庆丰厂的情况证实的那样,这批实习生因为凸显的中阿政治友谊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代表。中苏分裂之后,在中国看来,中美苏已鼎足三分,美苏“冷战共存、和平相处”,企图“包围依旧坚持马列主义真理的中国”。^⑧中国意图在中阿关系上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模式,以展现一个团结于资本主义世界和修正主义集团之外的真正亲如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在中国领导人的理解中,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不同于以“重利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国家关系,它应当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之上,双方不讲求利益或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以此来争夺那些在中苏间摇摆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中方的规划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已不仅仅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更是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⑨作为技能和政治思想上表现优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在中国的互动和学习象征了两国革命道路的融合,其中,中国的角色是师傅,阿实习生则是年轻的学生,中方迫切地希望展现出好的一面,不仅是技术,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而,必须先

① “中阿两国关系大事记(1949—1959年)”,外交部档案,109-00908-01,第43页。“刘明夫关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问题的发言稿”,1959年3月,江苏省档,3124-0087,长期,第80页。

② “李先念同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谈话记录”,1959年1月15日,外交部档案,109-00907-06,第61页。

③ “李富春、李先念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会谈记录”,1960年9月,外交部档案,109-00960-02(1),第9—26页。

④ “成套设备公司关于阿尔巴尼亚磷肥厂实习生合同”,1964年3月15日,江苏省档,3124-0138,短期,第1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八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73页。

⑥ “国务院外办、教育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实习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及中央批示”,1962年7月20日,江苏省档,3124-0142,长期,第1—2页。

⑦ 从1953年到1963年,越南和朝鲜实习生占来华实习生总数的八成,粗略估算至少有13000人。详见“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北京市档,102-001-00307,第36页。

⑧ “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1963年9月,江苏省档,3124-0177,长期,第1—25页。

⑨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4356,第11页。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二、从“兄弟”到“另类”:实习生与中方的接触与摩擦

从1961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肩负塑造两国劳动者友谊的重任成批来到中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实习生与中国工人干部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设想的那样亲如兄弟,最初,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与中国基层工人干部之间冲突不断。

其实中方早在1960年就零星地发现阿实习生“难搞”。于1960年在上海实习的阿实习生被中方批评为“工作消极、爱享受、性情急躁、漠视纪律”。^①在北京的阿实习生时常在各个饭店“乱串”,并“说东道西”。^②当更多的实习生来华之后,问题便集中和系统地暴露出来。

尽管周恩来曾经要求外国实习生的物质待遇要适当,^③但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却例外。1961年,中方将第一批阿成套项目实习生的津贴定为每人每月100元,^④远超朝、越等国实习生的45元标准,也高于当时中国高级工人的收入,^⑤在1960年代初中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实属破格。中方给予高津贴的主要目的是照顾实习生的饮食营养,但实习生并不完全领情,他们认为工厂每月扣除的60元伙食费过多,要求尽量在食物上少花钱,多发现金用于购买礼物和奢侈品,以便回国“炫耀”自己在华的特殊礼遇,上海大津厂的实习生在拿到第一个月的津贴时,就到南京路上疯狂购买昂贵礼物。^⑥但同时,他们又挑剔饭菜的质量,怀疑食堂克扣伙食费,甚至因为饭菜不好而抗议。

与生活上的特殊化要求相比,阿实习生工作上的问题更多。为了让阿实习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多数基层工厂在实习生到来之前煞费苦心地质订了极为详细的学习计划,但并非全部实习生对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予以理解,尤其是那些有着高学历或是资深工作经历的实习生,他们觉得中国人拿自己当小学生,因而在工作中随便敷衍,经常在粗粗地看一遍师傅的演示之后就宣布已经掌握了通常需要反复练习才可以练就的技术,但考试的时候表现得却很糟糕。对于刚刚

① “上海丝绸工业公司关于阿实习生学习要求的请示报告”,1960年12月,沪档,B134-1-911,第44—46页。“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实验工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1年7月,沪档,B163-2-1217,第20—27页。

② “曾涌泉与阿驻华大使帕里夫蒂谈话记录”,1961年4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3141-02,第20页。

③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1356,第26页。

④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北京市档,102-001-00307,第57页。

⑤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1356,第27页。当时北京工人的每月全部收入在70—80元之间,一般的单位职工只有50元左右。

⑥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情况简报(第二期)”,1964年3月,沪档,B163-2-1773,第20页。

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带来的惨痛教训的中国人而言,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表现出来的骄傲自满和轻浮冒进显然是危险的。

矛盾最为尖锐的则是夜自修制度和周末加班制度。中方安排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进行夜自修,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及时掌握白天学习的内容。^①对于中国工人干部而言,这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以便赶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必须做出的合理的个人牺牲,但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却百般抵制,他们无法忍受中国工厂里不分昼夜的劳作制度,虽然一部分实习生从开始便遵守了夜自修制度,但更多的实习生要求取消自修,以便有足够多的时间准备晚上出去遛马路。由于实习工厂大部分在大城市周围,因此他们坚持要求厂方周末放假并安排专车接送他们到繁华的市区购物、散步。上海市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几乎每周末都会到市中心活动,在阿实习生最多的1963年和1964年,人们总可以在南京东路、淮海中路一带看到他们的行踪,以至于几个大型百货商店的营业员都能准确认出每个阿尔巴尼亚实习生。^②

即便是在被认为问题最少的政治态度方面,阿实习生也有问题。中方发现并非所有的实习生都如公开宣布的那样在政治立场上鲜明、坚定地反帝反修,虽然这部分实习生的人数很少,但在当时,这却是十分敏感的站队问题。1964年,上海大津厂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实习生竟然对政治漠不关心,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只是口头上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除了逛商店外,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③

最令中方头疼的是男女关系问题。在阿尔巴尼亚实习生集中的上海、江苏和兰州,仅1960年就发生了数起实习生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不轨行为,^④1961年之后,阿尔巴尼亚实习生与中国女性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有增无减,到1963年,公安部发现阿实习生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比较突出。^⑤1964年,此类事件在阿实习生较为集中的城市均有发生。6月7日,上海电缆厂实习生组长皮特里·卡拉米特里在中山公园内与一中美混血儿发生性关系,被揪送公安局。^⑥大津厂实习生哈鲁尼在三个月内对数名女工和女翻译进行性骚扰,乃至在受到中方的劝阻后,他竟抱怨“阿尔巴尼亚男的要姑娘走,她就挽着男的臂走了,中国就不好”。^⑦在南京,华东化工学院教员朱曼

①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4356,第17页。

② “上海大津造纸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总结”,1964年12月26日,沪档,B163-2-4773,第4页。

③ “上海大津造纸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简报(第四期)”,1964年4月,沪档,B163-2-4773,第26页。

④ “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实验工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1年7月,沪档,B163-2-4217,第23—27页。“第四次全国外事会议记录”,1960年7月,江苏省档,3124-403,长期,第139—153页。

⑤ “公安部关于加强外国留学生、实习生社会管理工作的意见”,1963年11月25日,北京市档,102-001-00308,第678—685页。

⑥ “外经委代表与阿驻华使馆会谈记录”,1964年8月18日,沪档,B163-2-4772,第51—52页。

⑦ “关于哈鲁尼侮辱妇女事件的报告”,1964年7月30日,沪档,B163-2-4772,第87—88页。“上海大津造纸厂实习生动态简报”,1964年9月25日,沪档,B163-2-4773,第32页。“上海大津造纸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总结”,1964年12月26日,沪档,B163-2-4773,第5页。

玲和南京化肥厂阿实习生捷尔卡数度私下幽会,并屡教不改。^①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比较集中的兰州化工厂也发现不少类似问题。^②

实习生的行为引发了中方干部工人的反感和厌恶。在上海大津厂,工人们为实习生使用生活津贴到南京路上大肆采购奢侈品的行为咬牙切齿,他们偷偷地讥讽阿实习生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指责他们到中国来是为了发洋财,抱怨实习生的高规格津贴是不平等的待遇,翻译甚至拒绝与实习生交流。^③管理干部也对实习生不满,大津厂培训办公室负责人曾气愤地要求工作人员对实习生“凶过他们的头”,^④并借用毛泽东的诗词挖苦实习生的骄傲自大如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⑤中方干部们希望实习生早走早太平,并对实习生提出的要求加以抵制。^⑥女工们则十分害怕,她们进出结伴,相互提醒要防色鬼。^⑦很显然,在中方干部工人眼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形象已经从预想的亲密、勇敢、勤劳的社会主义兄弟,蜕变成脾气暴躁、无纪律、好逸恶劳并且不检点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另类”。

中方工人干部对实习生另眼相看的动机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对实习生优厚待遇的嫉妒,也有因为实习生的到来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的伤害,同时还有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找出造成中方干部工人将实习生视为“另类”的带有普遍性的原因。

首先,中阿双方对“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概念认知迥异。在中方的主流价值观中,“艰苦朴素、勤学苦练、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奉献精神是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⑧1960年代,建立在社会主义教育基础上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已经被构建成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之一,这种理念在经历了数次思想改造和教育的中方干部工人意识中已经被普遍地内化为一种本能的自律,成功地主导了中国基层工厂中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种“舍己为人,不计酬劳”的日常生活价值衡量标准。在刚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底层劳动群众看来,以劳动者身份来到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爱面子、爱享受、脾气暴躁、自私散漫”的言行被认为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实习生的品质与那些已经被提前隔离的“危险分子”几乎无异。

其次,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也部分地造成了双方的冲突。正如伊斯梅尔·卡达

① “关于朱曼玲与阿实习生捷尔卡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况报告”,1965年8月2日,江苏省档,3124-0138,短期,第189—194页。

② “魏立人与实习生领队萨发等人的谈话纪要”,1965年8月30日,甘肃省档,269-1-10,第132—143页。

③ “上海市轻工业局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5年3月10日,沪档,B163-2-1772,第29页。

④ “上海市轻工业局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5年3月10日,沪档,B163-2-1772,第29页。

⑤ 同上,第30页。

⑥ “上海大洋造纸厂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情况纪事”,1964年6月5日,沪档,B163-2-1773,第69页。

⑦ 笔者采访陈育英,2010年12月。

⑧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计划”,1963年7月24日,江苏省档,3124-0138,短期,第87—88页。

莱在《破碎的四月》中所展示的那样,封闭的高地环境催生了阿尔巴尼亚人直爽、易怒的民族性格以及山民和客人间的人情认知,在他们看来,客人是异常珍贵并且可以用鲜血去保护的;^①当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来到中国之后,山民和客人的角色出现互换,中国人则成为有义务用“鲜血”来捍卫自己的主人,因而,当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则会以其民族性格中特有的直爽的方式表达不满,这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而言,却被理解为一种“喜怒不定、性情怪僻”的人格缺陷。

最后,男女关系上的矛盾显示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两性问题上的文化认知差异。阿尔巴尼亚人关于两性的观念要远比中国人开放,私人而亲密的异性关系可以自由展现于公众视野中,夫妇情侣可以无所顾忌在街上挽手、亲吻,即便婚姻中出现第三者现象,也只会被认为是道德问题。^②而在中国,公开并且过分亲密的两性关系和婚姻中的第三者现象均会被视为旧社会妻妾成群的封建婚姻而遭到批判,即便是男女之间保持相对宽松的私人关系也存在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国人关于两性关系的文化认知中,私人性质的男女关系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三、“新友谊”的诞生

中方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问题心知肚明,公安部、外经部等主管部门评价阿实习生“思想认识片面、生活要求高,作风散漫,男女关系不严肃”。^③中方内部的调查显示,1960年以来不断增加的实习生案件,阿实习生占20%,远高于朝鲜、越南两国的3%和5%—7%,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首,^④考虑到相对较少的人数,阿实习生中的“问题分子”比例极高。

1963年中阿双方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交涉。10月,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致函阿大使馆,提醒阿方加强实习生的选派工作,同时,中国外交部也要求驻阿使馆留意每批来华实习生的政治情况。^⑤阿方主管部门积极配合,12月13日,中阿双方负责人会面商谈,中方建议阿方加强实习生的思想教育和守法教育,阿方决定由阿驻华使馆出面直接负责实习生的教育工作。双方还决定建立密切的联络和协调机制,对外经济联

① 肖锋《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评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破碎的四月〉》,《三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77—80页。

② “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接待阿尔巴尼亚进修生艾·多多纳情况简报(第四号)”,1963年11月8日,江苏省档,3124—0167,短期,第28页。

③ “外经委关于阿实习生工作座谈会总结报告”,1965年3月,沪档,B29-2-1356,第74页。

④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北京市档,102-001-00307,第52页。

⑤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向驻阿使馆了解阿方选派实习生情况”,1963年11月,外交部档案,109-02655-03,第123—124页。

络总局、教育部和各级外事部门将与阿方负责实习生事务的专员保持直接和定期的联系。^①

然而,中阿双方的外交协调和阿使馆采取的内部教育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4年发生在上海、南京、兰州等地的一系列严重冲突事件令中方感到问题严重,而此时,中阿两国关系不断升温。1964年6月,中方发现自年初周恩来访阿之后,阿尔巴尼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显著变化,阿方在意识形态上强化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观念,^②实际上是向中共的反修路线靠拢。因而,对于中方而言,在阿实习生中建立“社会主义兄弟友谊”已不仅仅是保证技术转移的问题,更是事关中阿两国政治联盟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已经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③

1965年3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座谈协商对策。会议分析了造成中阿双方矛盾冲突的原因,认为根源在于负责培训工作的中国干部没有意识到“培训工作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而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被认为是改善阿实习生培训工作的优先重点,主管部门要求基层培训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以此启发实习生“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培养热爱劳动、刻苦钻研的习惯,养成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进而“巩固和发展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革命性”。^④尽管中方已经注意到了两国相异的民族性格特点、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是造成矛盾冲突的原因,但这只被视为“一般问题”。^⑤这次会议确定了“政治优先”的培训新方针,它改变了195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技术为主,思想政治辅之”的外国实习生培训方针,^⑥并对1963年8月全国实习生会议确定的“施加影响是付(副)产品”的目标做了修正。^⑦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中方将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视为反苏的一个重要措施,除了要求实习生“反修反帝”、拒绝苏联的影响外,^⑧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实习生的世界观成为中方施加影响的主要目标,^⑨而这得到了阿方的支持,霍查曾在此前后公开赞扬中国技术人员是“毛主席

① “杜干全与阿使馆临时代办关于实习生培训工作的会谈纪要”,1964年12月13日,外交部档案,109-03720-01,第9—15页。

② “阿尔巴尼亚强调以阶级斗争精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64年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总第1060期。

③ 1965年前后,中国援阿部门发现阿尔巴尼亚国内人力紧张,技术工人缺口很大,无法跟上中国援助之下的大规模建设进度。参见“援助阿尔巴尼亚成套项目近况”,对外经委办公厅编《对外经援动态》,第35期,1965年9月3日,山西省档,20.2.2-2。

④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座谈会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4356,第76页。

⑤ “外经委关于阿实习生工作座谈会总结报告”,1965年3月,沪档,B29-2-4356,第71—97页。

⑥ “国务院关于对朝、越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检查报告的指示及报告全文”,1955年12月7日,湖北省档,SZ34-003-0244,第1—23页。“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就外国实习生、留学生工作汇报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批示”,1955年11月10日,湖北省档,SZ1-2-297,第70—73页。

⑦ “张彦在外国实习生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8月,江苏省档,3124-476,长期,第13页。

⑧ “杜干全在外国实习生工作会议上的小结发言”,1963年8月19日,沪档,B29-2-4356,第41页。

⑨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沙黑塔拉依用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观察世界”,对外经委办公厅编《对外经援通讯》,第11期,1966年6月18日,山西省档,20.2.2-2。

培养出来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的专家”。^①

既已确立新方针,下一步便是树立典型。中方主管部门在这次座谈会上表扬了一对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及其结晶:作为徒弟的阿实习生在8个月内迅速达到了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才可以实现的中国四级工水平,还学到了师傅几十年来积累的绝技和硬功夫。徒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在男女关系上屡屡犯错的实习生哈鲁尼,师傅则是大沔厂的技术工人周根富。哈和周的“亲密关系”最终被列入了榜样的名单,成为1965年之后中方在个人层面所要塑造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典范。

最先需要处理的是男女关系问题。在华外国实习生的男女关系问题主要有正常的恋爱关系和“不正当男女关系”,对于前者,中方并未禁止,陈毅曾于1962年批准柬埔寨实习生与中国女子结婚。^②不正当的私下的男女关系则被要求严加提防,中方分析这种男女关系的产生不仅仅是实习生的问题,更是中国姑娘的主观意愿,公安部1963年9月的调查证实与阿实习生私下来往的中国女子在政治和生活作风上多数有问题。^③考虑到这会严重损害新中国形象以及中阿之间日渐特殊的国家关系,公安部被迫低调处理,甚至阻止内部人员研究对策。^④但实习生的表现却让中方意识到低调处理难以解决问题,尤其是1964年上海电缆厂实习生组长皮特里·卡拉米特里和大沔厂实习生哈鲁尼的表现,两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均系“惯犯”,他们在事发后拒绝教育,态度顽劣。^⑤

1965年3月,“内紧外松,抓苗头”被明确为新的应对方针。在此前后,与阿实习生有“来往”并且被证实是勾勾搭搭的中国女子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处罚,南京市将她们调离工作单位,并且是“越远越好”,^⑥甘肃省委也对此类问题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⑦同时,保卫部门开始严格限制中国女子与实习生的私下往来,也即“抓苗头”。

① “霍查同志关于氮肥厂建设问题的谈话摘要”,1965年11月30日,对外经委办公厅编《对外经援动态》,第45期,山西省档,20.2.2-2。

② “柬埔寨驻华使馆关于两实习生要求为中国妻子赴柬发护照事的照会”,1962年12月21日,外交部档案,118-1480-02,第12—16页。

③ “凌云关于留学生、实习生社会管理工作的报告”,1963年9月,江苏省档,3124-0176,长期,第66页;“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实验工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1年7月,沪档,B163-2-1217,第20—27页;“市计委援外办公室关于实习生皮特里·卡拉米特里与一中混血儿发生不正当关系的问题致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沪档,B29-2-1347,第182—184、189—194页;“关于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培训工作的最近情况报告”,1965年9月9日,甘肃省档,269-1-10,第20—23页。

④ “张彦在外国实习生工作会议上的谈话”,1963年9月,江苏省档,3124-0176,长期,第16页;“外援工作问题”,1963年9月,江苏省档,3124-103,长期,第265—268页。

⑤ “市计委援外办公室关于实习生皮特里·卡拉米特里与一中混血儿发生不正当关系的问题致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沪档,B29-2-1347,第182—184页。

⑥ “关于朱曼玲与阿实习生捷尔卡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况报告”,1965年8月2日,江苏省档,3124-0138,短期,第189—194页;“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简报(第9期)”,1965年7月20日,江苏省档,3124-139,短期,第30页。

⑦ “省委对省人委外事办公室关于胡珊与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纳高乱搞两性关系的批复”,1966年8月10日,甘肃省档,91-005-0708,第58页。

上海大中华造纸厂的保卫干部在发现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职工家属李某与阿实实习生私下联系后,立即要求李与其断绝往来。^①兰州化工厂的保卫干部尽量限制该厂女职工与阿实习生的接触,以至于阿实习生误认为中方在阻止中阿友谊。^②同时,阿实习生与中方女性之间的公开接触依旧存在并受鼓励,中阿双方一致主张在双方人员之间多搞一些公开的集体活动而非私人接触。^③负责培训的工厂单位经常组织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的中国工人与实习生接近,这些集体活动包括参观工厂和革命遗迹、集体联欢、反修学习、讨论国际问题等,为数不多的男女之间的交流内容几乎都和政治有关,而关于私人问题的谈话则尽量避免,这种公开的男女接触被认为是为了建立亲密无间的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在中方的观念中,这种革命的男女关系是要远离两性和私人情感问题的。

第二项塑造新友谊的重要措施是“四结合”。^④中方认识到老师傅、翻译和教员是实习生日常接触最为密切的人群,“四结合”就是要求他们构成以实习生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圈,以便集中力量“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对实习生施加影响。^⑤管理干部要求参与“四结合”的人员准确地把握基本的政治立场,既要防止对实习生的缺点无原则迁就、讲究一团和气的“小国主义”和“个人主义”,^⑥也要根除在实习生面前表现得高高在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另外,消极对待实习生的做法也被认为是“缺乏阶级感情”而加以制止。^⑦老师傅、翻译和教员被要求杜绝带有个人感情的做法,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阿实习生的行为:他们确实存在一些个人问题,但与其反修反帝的政治立场相比,这些缺点是次要的。^⑧前文提到的中国师傅周根富就曾被告知与哈鲁尼交朋友时要抛弃个人己见,为两国的友谊而奉献。^⑨除了政治立场,老师傅也需要掌握策略,战争年代积累的重点突破和统一战线的方法被应用到实习生的工作中去,在所有实习生中,组长、支书和一些积极分子成为交朋友的重点,在遇到问题时,要想方设法地使实习生内部分化,要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影响落后分子,以达到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目的。^⑩

为了配合核心圈的工作,长达三个月的思想和交朋友被列入培训工作的第

① “上海市公安局对如何做好对阿实习生的保卫和治安管理工作的一点体会”,1965年3月11日,沪档,B29-2-4356,第83—84页。

② “关于阿尔巴尼亚培训工作的最近情况报告”,1965年9月9日,甘肃省档,269-4-40,第22页。

③ “魏立人与实习生领队萨发等人的谈话纪要”,1965年8月30日,甘肃省档,269-4-40,第132—143页。

④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座谈会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4356,第76页。

⑤ “外国实习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1962年7月30日,外交部档案,118-01024-02,第20页。

⑥ “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实验工厂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1年7月,沪档,B163-2-4217,第26页。

⑦ “上海市轻工业局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小结”,1965年3月,沪档,B29-2-4356,第94页。

⑧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座谈会总结”,1965年3月,沪档,B29-2-4356,第74页。

⑨ 笔者采访周根富,2010年12月。

⑩ “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4356,第21—22页。

一阶段。老师傅、翻译、教员和部分先进分子被安排与实习生进行日常接触,他们通过各种集体活动主动接近实习生,培养与实习生之间“无产阶级兄弟”般的感情。^①尽管少数人员并不擅长人际交往,但大部分人如实地执行了命令,这项特殊任务在当时有一种十分明晰的目的: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培养技术和政治上均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核心圈之外的普通职工也被要求配合这项工作,以此为目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对外经委要求基层培训单位建立机制性的针对职工的教育工作,要“从内到外,先内后外”地开展国际主义教育。^②

老师傅和实习生之间的“个人友谊”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从1964年底开始,中方尝试安排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访问老师傅家庭。访问的程序被精心规划,中方主管部门会提前对每个师傅家庭及其周围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采取包括清理卫生和限制社会上游散的“危险分子”在内的措施。^③访问过程中的互动也被精心设计,群众被安排在老师傅家门口列队欢迎并营造气氛,中国师傅及其家属要按照事先准备的讲稿发言,通常情况下,老师傅需要向实习生讲述自己的家史,^④它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旧社会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的悲惨经历以及这个家庭在新中国政府的照顾下重获新生的过程。为实习生准备的便餐超过了一般普通中国家庭的接待标准,这是为了展示中国工人殷实的物质生活和热情好客的情操,同时也为了让实习生亲身体会到,只要能像师傅那样勤劳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牛肉和面包”早晚会有。^⑤

中方在塑造个人友谊方面的种种努力得到了阿方的支持,对外经委发现1965年以后来华实习生的“政治质量”有明显提高。^⑥以政治任务的方式推动个人层面的友谊制造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积极作用,现有的材料显示“文革”时期最初几年内来华的阿实习生无论技术学习还是政治都表现得比之前要出色,^⑦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不轨行为也鲜见于档案,并且随着中国援建的项目陆续完成,实习生不仅完成了部分的技术转移工作,同时也成为在双方公共媒体上塑造中阿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重要角色。^⑧

①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生活管理和社会管理工作计划”,1964年12月22日,江苏省档,3124-0138,短期,第137—138页。

② “对外经委关于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座谈会的总结报告”,1965年3月,沪档,B29-2-4356,第75页。

③ “大中华造纸厂关于阿实习生访问老师傅家庭问题的报告”,1964年11月20日,沪档,B163-2-4774,第39—43页。该文件被上报外经贸部。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座谈会总结”,1963年8月,沪档,B29-2-4356,第78页。

⑦ “省外办关于当前培训外国实习生工作情况的报告”,1969年6月,江苏省档,3124-0125,永久,第79—87页。

⑧ *Zëri i Popullit*, 27 Janar, 1966 《人民之声》,1966年1月27日;《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中文版),1966年第2期,第8页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4日 《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

四、“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破裂

中国师傅、工人和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在中阿两国的媒体中继续塑造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同时,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与实习生建立真实的个人友谊愈发困难。

唐某是南京磷肥厂卡尼龙材料车间的一名工人,因曾有反革命言行,厂保卫干部十分留意唐与实习生的接触,1965年5月,唐在玄武湖划船时与实习生支部书记合影,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即便是对于政治清白的普通工人而言,与实习生私下接触也需要谨慎,该厂一名汽修工因为经常同一个实习生接触,保卫干部在并未了解其动机的情况下,将他列入了黑名单。保卫干部还特别关注一些实习生出没的公共场合,以便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密切关注实习生居住的招待所门前的空地,因为经常会有职工在那里与实习生合影,而有些人“是不可靠的”。^①厂外人员与实习生的接触则让中方的管理者更为敏感,上海电缆厂发现有个懂外语的职员用阿语“勾搭”实习生后,就立刻派人去调查,发现此人在大学时期就常与苏联等国学生私下交往,并有劣迹,派出所很快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教育。^②

对于实习生而言,围绕“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互动开始逐渐失去吸引力。1965年前后,在训人数较多的兰州化工厂出现了令中方颇为尴尬的21名阿尔巴尼亚实习生集体要求提前离开中国去意大利的问题,^③在这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吸引力显然超过了社会主义中国。另一方面,以政治优先为方针的实习生培训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传授效果,^④中方在1967年之后开始缩减接收规模,^⑤并尽可能地改为派遣技术专家赴阿进行就地培训,以满足阿国内不断增长的技术工人需求。

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缓和进程的开启,中国开始改变与西方直接对抗的政策,中阿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以政治任务和被宣传的意识形态共同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在遭遇中阿两国革命道路分裂的情况下即刻破裂。

1973年是“文革”开始后中国计划接收外国实习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在所有计划来华的4278名外国实习生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只有512人,仅为越南的六分之

① “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工作简报(第9期)”,1965年7月20日,江苏省档,3124-439,短期,第30页。

② “上海市公安局对如何做好对阿实习生的保卫和治安管理工作的一点体会”,1965年3月11日,沪档, B29-2-4356,第83—84页。

③ “关于接见阿驻华大使馆参赞卡萨比的情况简报”,1965年8月16日,甘肃省档,269-4-40,第111—117页。

④ “第一轻工业部援外工作十年总结”,1965年4月,天津市档,78-615,长期,第64页。

⑤ “对外经委1967年接受外国实习生计划”,1967年2月,江苏省档,3128-0020,长期,第11页。“对外经委1968年接受外国实习生计划”,1968年2月,江苏省档,3128-0027,长期,第8—10页。“对外经委军事管制小组、外交部:关于改进外国实习生培训工作的意见”,1970年2月23日。

一。^①此时,来华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已无法享受精英式的待遇,他们的物质待遇已经和苏丹、锡兰等第三世界国家实习生相差无几。^②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已不再肩负塑造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重任,他们的实习期限大多被缩短到两到六个月,以完成基础性的操作训练,外经贸部则要求培训期间对实习生采取“内外有别”的策略。^③

在随后的几年中,不再肩负塑造中阿两国社会主义兄弟友谊任务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开始在中阿冲突中扮演反面角色,在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最为集中的上海地区,实习生和中方人员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尼克松访华后,阿实习生与中方人员之间氛围异常。冲突首先在放映电影和电视的问题上出现,这种在 1960 年代被用来在中阿人员之间增进友谊的宣传途径此时已经成为双方矛盾爆发的窗口。1973 年 12 月,上海吴泾煤气厂举行工人活动时播放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新闻短片,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全部离席抗议,令中方十分尴尬。^④而此类“退场抗议”的事件已不是第一次,早在 1972 年 6 月,阿实习生的抗议就引起了中方高层的注意并采取了防范措施。^⑤尼克松访华引起的风波过后,阿实习生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要求中方放映意在影射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电影,中方不得不谨慎提防。^⑥

围绕播放电影、电视的暗斗折射出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很显然,阿实习生与中方之间的友谊已荡然无存。1976 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七大上公开反华之后,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激化,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在阿使馆的组织下采取各种方式对抗中方。1977 年 7 月,在上海冶炼厂,实习生多次在市区公共场合集体唱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示威,^⑦此类事件愈演愈烈,使得中方人员“想想就有气,看看就触气”。^⑧

在 1978 年年初,实习生与中方人员之间的敌视更甚,甚至连以往作为形式的欢送典礼也经常变得不冷不热。7 月,最后一批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因为中国决定停止援助而提前回国,^⑨中阿之间经过二十余年塑造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很快湮没于历史的记忆中。

① “外经贸部关于 1973 年接受外国实习生计划”,1973 年 5 月 14 日。

② “培训外国实习生费用开支试行规定及当前各国实习生费用负担情况对照表”,1971 年 11 月 26 日,河北省档 926-2-5,第 9 页。

③ “外经部关于培训外国实习生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1972 年,河北省档,1057-2-9,第 44 页。

④ “上海吴泾煤气厂培训办公室《情况汇报》”,1973 年 12 月 6 日,沪档, B246-2-1193,第 29 页。

⑤ “外交部、外经部关于‘不要安排越南、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观看尼克松访华的电影’的通报”,1972 年 6 月 3 日,河北省档 979-10-826,第 14—16 页。

⑥ “外交部、外经部关于放映兄弟国家实习生提供的电影片问题的意见”,1974 年 9 月 19 日,河北省档, 1057-2-41,第 8—12 页。

⑦ “《上海冶炼厂培训简报》第 18 期”,1977 年 7 月 27 日,沪档, B246-3-595,第 112—113 页。

⑧ “《上海冶炼厂培训简报》第 19 期”,1977 年 8 月 12 日,沪档, B246-3-595,第 114 页。

⑨ 《人民日报》,1978 年 7 月 17 日。

五、结 语

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并没有真正达到缔造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目标。当我们思考其失败的原因时,首先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公共外交行为从一开始便被视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使其成为革命外交路线之一种特殊的公共外交行为,当中国于1970年代末放弃革命国家的角色之后,这种公共外交行为必然走向终结。尽管今天此种公共外交政策已不存在,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容忽视。

首先,革命外交路线之下的公共外交行为的基本特征在于以追求单一的意识形态共同性为前提和目标。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是以中阿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为前提的,而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则是联盟的重要基础,中方之所以一开始就计划让这种个人层面的友谊成为塑造新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因为实习生能以社会主义建设栋梁和革命者的身份成为中阿之间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关系的具体政治象征。而当中阿之间出现意识形态分歧之后,公共外交的作用已不存在,相反,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扮演了敌人的角色。

其次,革命外交路线之下的公共外交行为过分追求意识形态利益,难以实质性地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实习生与中方人员最初爆发的一系列冲突表明,除意识形态因素外,不同的民族性格、两性文化和劳动价值观等非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公共外交政策所需要考量的,而中方却基于意识形态目标的考量,对问题采取了政治化和简单化的理解,这注定了这场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缺乏稳定的社会情感,远离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尽管群众运动也被发动起来了,但对于那些与实习生密切接触的工人干部而言,制造友谊的动机更多地来自于国家意志。换句话说,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已经被意识形态绑架,事实证明,它难以实质性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解决公共外交中出现的主要因为民族性格、社会文化价值观差异等一系列非意识形态因素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时,应该采取更加艺术的手法;就更为宏观的层面而言,我们需要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更为巧妙地调和国家整体目标与群体、个体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防止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带来负面作用——尽管宣传意识形态是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

(责任编辑:李 丹)